

序

明中叶后，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异采。这就是产生了一种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甚为类似，但又不能混同的人文主义思潮。汤显祖就是勇敢地站在这一思潮前列的重要人物。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戏剧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思想家、美学家。因为他不仅在他的光辉剧作里讴歌了一种有浓烈的近代人文主义色彩的美的理想，而且还企图从理论上去解释它和论证它。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重大局限，他还不能真正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但他的极富原创性的大胆思考，对新的美的理想的不倦追求至今仍有值得细加研究的重要价值。过去对汤显祖的研究，大部分是侧重于对他的戏剧的研究，即把他作为一个戏剧家来研究。邹元江同志的这本书，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把汤显祖的生平、思想、人格、艺术、美学密切联系起来，作全方位的研究，甚为准确而全面地概括了汤显祖思想与艺术的基本特征，并分析了它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这是本书的特色与成就所在，对把汤显祖研究引向深入，将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由此书的出版，我还为我国新一代年轻的学者正在迅速成长而感到高兴。瞻望二十一世纪，我国新一代学者将会在批判继承我国悠久光辉的思想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作出新的创造，以

推动中国文化新的全面的复兴，并对世界作出贡献。回顾汤显祖和其他先哲走过的艰辛探索的道路，我们应当更加奋发努力。

刘 纲 纪

1998 年 1 月 2 日 于武汉大学。

引言

汤显祖作为伟大的戏剧家是世所公认的。但汤显祖并不仅仅是一个戏剧家。明万历年间的“学官诸弟子”之所以“争先北面承学”于他，就因为他们认定汤义仍“所繇重海内，不独以才”。即他不仅仅有诗赋灵性、艺术天才，更重要的是有思想，而且其深邃广博为一般学官“闻所未闻”，以至“诸弟子执经问难靡虚日，户屦（jù，古时用麻、葛等制成的鞋）常满，至廨舍隘不能容”。^①

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汤显祖四十二岁，因上切责执政的《论辅臣科臣疏》震撼朝野，被贬谪雷州半岛的偏僻小县徐闻。也正是在这前后，他“从信仰者转变为思想者”。其思想锋芒逐渐显露。但由于承学、社会、家庭等多重影响，其思想也异常复杂、矛盾。正如他自己所说：“家君恒督我以儒检，大父辄要我以仙游。”^② 临川四梦的思想倾向就被评家议为“《紫钗》侠也；《还魂》鬼也；《邯郸》仙也；《南柯》佛也”。^③ 由此可见一斑。

汤显祖自幼就因谈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哲学命题而被督学大加赏识，视为奇才，名噪海内。当时学官都以能拜见他一面而深感荣幸，就连几任国相也欲招延他以张门面，却被他婉拒。他一生都在“思想”的道路上跋涉、探索，其学养“五经而外，读诸史百家，汲冢、连山诸子”对“天官、地理、

医药、卜筮、河渠、墨、兵、神经怪牒^{3④}亦精通。然而，他又具有一个思想家的品质 是一个“难动者”之“精奇”而非“易动者”之“蚩民”，^⑤即他决不迷信谁 有他独立的思想理路 所谓“我能转法华，不为法华转”。他虽对宋明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窃有慕焉”却对程颐、张载、朱熹对六经神秘、机械的解释作法颇有微辞 认为是“逊心圣道”。^⑥他虽对儒、释、道多有研习 白云“拟日用于仁智 转机于玄释”而且与泰州学派的重要代表罗汝芳、一代名僧真可 达观 及名噪一时的李贽多有师生、受记或结交、仰慕之意，但并不轻易接受他们的思想。他一生从未信过禅佛（虽然他青年时代读过释典 讲过禅佛之学）也对李贽“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之说持保留态度 而强调对“情”要“持转易之关”。^⑦这是对当时“活生生的血肉之心、血肉之欲即理”的纵欲倾向的反拨。他一生都以道气为宗，情张之，儒侠实之。虽然他在“儒检”与“仙游”之间矛盾了一辈子 可“儒检”总占上风 即一生都在梦想积极入世 建功立业 甚至认为诗人也“诚不足为”。“吾所期为于用世”^⑧可见他并非想“仙游”皈依宗教。虽然他晚年也欲结莲社 入寺参禅 但他的“情”根太深 终不能超脱人世 因而其《诀世语》强烈地反对僧人为他死后念佛超度 认为这都是虚假的东西，不相信虚幻的彼岸世界。

由此可见 汤显祖是明末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具有浓厚深刻的思想家气质的伟大艺术家，他一生思考的痛苦正是与导致后来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启蒙思想的艰难蜕变产生的阵痛相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比影响巨大的李贽更复杂，比同时代的学人、曲家如徐渭、“公安三袁”等更深刻。在哈姆莱特自信地说人是“世界的美”（the beauty of the world），“万物的灵长”，不断追问“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时 汤显祖也在东方与之遥相呼应，积二十年生命的情感之思，让笔下的杜丽娘与李贽所盛赞的卓文君同时关注着“获身”还是“失身”的历

史之思。杜丽娘是明代后期思想解放运动中第一个追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的东方女性。如果说从女子婚姻自由意识和个性解放上更能看出时代的特征 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那么 杜丽娘' 为人在世 怎生叫做吃饭 ”^⑨这一追问，正是穿透近代已熏微的薄幕，飞向现代的一声响箭。这决不是一种巧合，这是东西方伟大智者、哲人的历史际会，是人类生命之流绵延艰难历程终于走向近代，东西方两大思维圆圈的历史性重逢。

汤显祖在“有法之天下”高扬“情至”之大旗，在当时及后代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公安三袁”的“性灵”说直接受到汤显祖思想的慧泽，汤氏《溪上落花诗题词》等可说是开了“公安派”以“趣”为核旨的小品文的先声。袁宏道读后曾拍案叫绝说：“妙甚，脱尽今日文人蹊径。”^⑩洪升十分推崇《牡丹亭》：“其中搜抉灵根，掀翻情窟……撰精魂而通变之。”^⑪他写《长生殿》即以“义取崇雅，情在写真”为主旨，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接擎汤显祖“情至”之大旗。至于曹雪芹的《红楼梦》以《牡丹亭》作宝黛爱情的催化剂^⑫，通过宝、黛、钗对《牡丹亭》的对立态度，概括反映了当时社会两种对立思想的冲突则是毋庸置疑的。汤显祖的“情至”思想不仅对明清戏曲剧作家、理论家、艺术家产生了持续广泛的影响，而且对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龚自珍、梁启超、严复及近代的陈独秀等也有重要影响。严复说，像“临川四梦”这样的作品，“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能持“天下之人心风俗”，使民开化^⑬。

马克思曾高度注意和评价“个别人物……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和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⑭因为只有紧紧抓住历史大转折时期伟大人物的“吐属”，美箭（亦如恩格斯所说的），才能真正把握一个时代思想潮流的走向。而真正处在这种历史转折大峡谷之间的时代巨人，从古至今都是屈指可数的。本书正是试图评述处在历史大转折之际的汤显祖作为时代巨人

的思想、形象 把这位在明末万历年间自觉地在哲学、美学、思想上进行苦苦探索、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又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思想家、美学家、艺术家，立体地、同情地加以再现、描述。通过他的道气论、贵生论、性命论来看他作为思想家的深邃；通过他的情至论、梦思论、真色论来看他作为美学家的风采；通过他的“临川四梦”诗词文赋来看他作为艺术家的气质。

汤显祖，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1550年9月24日）字义仍，号海若、海若士（一作若士），晚年号茧翁，别署清远道人。江西抚州临川县（今抚州市）人。原居汤家山，四十九岁辞官告归后移居沙井巷，建玉茗堂。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四代有文名。高祖峻明藏书四万余卷。曾祖廷用亦“勤学好文”。祖父懋昭是个“望重士林，学者推为词坛上将”的才子，四十岁后却笃信道教，闭户潜修。父亲尚贤却是个“为文高古，举行端方”的儒士。由此可见，儒道两家的思想都对少年时代的汤显祖有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家君恒督我以儒检，大父辄要我以仙游。”

汤显祖幼时颖异不群，人称“汤氏宁馨儿”。五岁时能属对，十三岁开始学习古文词，受业于古文词名家徐良傅。同年拜泰州学派大师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为师，这对他世界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他弱冠才华初露，二十一岁参加江西省秋试，以第八名中举，以一孝廉文一时“名蔽天壤，海内人以得见汤义仍为幸”。

汤显祖秉性正直刚强，“少有亢壮不阿之气”，不肯趋炎附势。固而中举之后，虽曾四度赴京都会试，却都落第而归。他和沈懋学、梅鼎祚都是罗汝芳的学生，为海内知名人士。当时的权相张居正为了让自己的次子中第，招纳汤显祖和沈懋学陪其次子共读，并许以巍甲，汤显祖都谢绝不纳。结果，沈懋学中一甲

一名，汤显祖却榜上无名。三年后，张居正的同乡王篆偕张的三子又前来结交汤显祖，再次许以巍甲，汤显祖说：“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⑮结果春试再次落榜。就这样十三年寒窗，四度落第，但其耿介磊落，仍初心不改，虽几经挫折，然终不能消此真气。^⑯直到张居正病死被劾，汤显祖才考中进士。但又因拒绝新任辅臣张四维、申时行的拉拢，又被排斥于“馆选”之外。虽然他很自负，声言“某颇有区区之略，可以变化天下”，但却不愿随波逐流，辱没人格。所以在北京礼部观政期间，“掩门自贞”，被时人目为“是狂奴，不可近”。^⑰

万历十二年（1584年）他到当时的“留都”南京做太常寺博士。在以后的七八年间他虽曾三易官职，都始终保持正直不阿、性刚傲物之气。在交友之中，“于世俗嗜好一切无所当，好谈天下事与天下贤人而已”^⑱与早期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李三才等过从甚密。

万历十五至万历十七年（1587~1589）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汤显祖目睹百姓疾苦和朝廷派到江南治理荒政的命官都无钱不贪的事实，清醒地认识到这是“精华豪家取，害气疲民受”。^⑲万历十九年（1591年）的闰三月，天空出现慧星，被视为是不祥之兆。一时朝野议论纷纷，神宗皇上震怒，将上天示儆怪罪于科道诸官，各罚俸一年。汤显祖对此颇感不平，上了一道《论辅臣科臣疏》，在揭露申时行等权相奸臣僭夺权柄、阻塞言路、拉帮结派，徇私舞弊，败坏朝纲的行径的同时，对万历皇帝本人也颇有微词：

陛下经营天下二十年于兹矣。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

这疏震撼朝野 汤显祖被诏切责“以南部为散局 不遂己志、敢假借国事攻击元辅”。^②由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贬谪到地处南海瘴疠之地的广东徐闻县当典史。这虽是个闲差，可汤显祖仍不辱使命 不久即倡建成贵生书院 并写了著名的《贵生书院说》，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所以“大人之学 起于知生。知生则知自贵，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也”。由贵生而贵人，由贵人而重人之真情 至情。“情”的思想在“贵生论”中得以孕育。

也就是在汤显祖被贬徐闻的第二年（1592年），他取道肇庆回临川，可能在肇庆会见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③。如果这是历史事实，那么汤显祖就是最早受到西方文艺复兴后的新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利玛窦在华期间所著的科学著作《勾股义》、《圜容较义》、《测量法义》以及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六卷，将无疑会给汤显祖以深刻的印象。利玛窦所带来的地球仪、天体仪、世界地图，也无疑会使长期在中国地图上看到明朝居于世界中心的汤显祖大开眼界。这对认识汤显祖的“意识境界”和情至美学思想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汤显祖被量移浙江遂昌知县”。在这个位于浙西南万山群壑中的贫瘠小县里，汤显祖一任五年，将此处作为他实现政治抱负的实验场。他简政爱民，扶持农桑，抑制豪强 除虎患、建书院 甚至除夕遣囚度岁 元宵纵囚观灯，用得民和，“一时醇吏声为两浙冠”。为了颂扬他的斐然政绩 遂昌百姓在“相圃书院”内为他建立了生祠。当他六十寿辰时，画师徐吕云受百姓委托，专赴临川为己辞官的他画像，携归悬于祠内。清顺治年间，遂昌知县缪之弼还为他建了“遗爱祠”。可见他在遂昌百姓心中有多么崇高的位置。

但正因为汤显祖为官清介方严 嫉恶如仇 也就不被当朝权贵所容，被长期困滞在一个与外界几于隔绝的小县里，不得伸展更大的抱负。汤显祖的好友刘应秋、顾宪成曾先后向首辅王锡

爵推荐他 却“几逢其怒”浙江巡抚王弘阳也曾向吏部推荐 亦遭阻抑。这使汤显祖内心很苦闷，深感“世路之难，吏道殊迫”，能施行于一县的“瞑眩”之法 却难有推广于天下的机会 即使能有机会，恐怕于江河日下的明王朝终无大补。而且他对官场逢迎谄媚的丑态极为反感，对那些“男子多化为妇人”的混迹宦宦之人更是鄙视。而最使汤显祖愤慨的，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神宗皇帝借收矿税之名，派宦官任矿监，四处搜刮民间金银财宝，搞得民怨鼎沸。他“补天”的梦想被无情的现实戳破。次年当他完成杰作《牡丹亭》后 冬日里去北京述职 不顾一些同僚挽留，毅然投劄告归。然而朝廷嫉恨他的人仍不放过他，三年后又对他以“负才轻佻”“浮躁”之名追论削职。

在这以后归隐乡居的十八年里，汤显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可他并没有丧失人格节操，以笔代剑，转战词场，以格韵高致的玉茗自喻。他“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宾朋杂坐，鸡埽豕圈，接迹庭户，萧闲咏歌，俯仰自得”；胸中块垒 陶写未尽，则发而为词曲”，②写出了后“二梦”传奇及大量诗、词、文、赋、尺牘等，连同过去所刊行诗文传奇，约一百余万言。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他曾与友人相约拟成立一个研究禅学的“栖贤莲社”结伴隐居庐山。后因双亲亡故和“情”根太深，且用世之心也终未泯，此事未能践行。

万历四十四年六月十六日（1616年7月29日 亥时）“一代才士”汤显祖溘然而逝，终年六十七岁。

汤显祖生活的时代，正是明王朝日趋腐朽、走向没落的时期。

1550年，汤显祖出生时，明朝已走过了一百八十二年的漫长历程。汤显祖历嘉靖朝十七年，隆庆朝六年，万历朝四十三年。在 1616年告别人世时，距明朝灭亡还有短短的二十九

年。就在汤显祖去世的这一年，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登上了王位 大清国建立。

从 1368 年明太祖朱元璋登基 到 1645 年崇祯上吊自杀 明朝二百七十余年间历十七位君王。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不断。尤其到了汤显祖所主要生活的万历年间，天灾频繁，政治黑暗，官逼民反，外族侵扰，封建王朝已呈衰败颓势，真有“民心如实炮，捻一点而烈焰震天；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②之虞。

万历十四年（1587 年）夏，江南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发生大水灾。万历十五年四月，北京大旱、大疫。七月，江北蝗灾，江南大水，杭、嘉、湖、应天、太平五府江河泛滥，平地水深丈余。又紧连飓风大作，环数百里，一望成湖。山东大旱，而开封、陕州、灵宝一带却因黄河决口，汪洋一片。

黄河以北的百姓以草木充饥，而陕西富平、薄城、同官等地饥民则以石粉为食。^③汤显祖诗《内弟吴继文诉家口绝谷有叹》所云“河海半相食，木砾饲老少”，即指在大灾中百姓断粮的惨状。

更惨的则连草木、石粉也吃光了，以人相食。汤显祖诗《饥》说：“西北久食人，千里绝烟影。”即便是京都开仓放粮，稀粥也要裁减“京尹裁施粥，市人稀说饼”^④。

如此凶猛的旱、涝、蝗、疫大灾难，到了万历十六年（1588 年）更在中国全境蔓延开来。三月，“山西、陕西、河南及南畿、浙江并大饥疫”。五月，“山东、陕西、山西、浙江俱大旱疫”。^⑤

这一年，汤显祖正在南京留都太常寺博士任上，亲历了南京一带“素屋少生烟，紫陌多流殍”^⑥的惨况。从阳春三月始，金陵城内就已尸骨无人收葬，滋生疾疫蔓延，真乃雪上加霜，造成“白骨蔽江下，赤疫骈门进”的惨境。^⑦到了炎热的夏季，饿殍遍地，南京各城门昼夜抬出死尸。因无棺木可寻，就用芦席草草包裹

落葬 其尸骨腐败 已使 天地日熏臭”。^②

汤显祖还听说在吴越间百姓“户口入鬼宿”，“叠骨与城厚”；而在“西河尸若鱼，东岳鬼全瘦。江淮西米绝，流饿死无复”。^③在江苏、浙江、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也因饥疫肆虐，“已绝行人径”连麦子都无人收割。^④汤显祖的家乡江西抚州临川县本是“数载年谷多 出入颇流滥”的富饶之地 这时也闹起了饥荒，一小斛米甚至卖到一千钱（“云何忽饥贵，小斛千钱甌”^⑤）。

从万历十四年五月间江南发大水成灾，到万历十六年“普天饿”、“绝行人”灾疫愈演愈烈。直到万历十七年六月 南京、浙江又大旱不止，太湖亦水涸，汤显祖和百姓都尝到了“水价日百钱”的焦渴滋味。“他生常苦饥 今生直愁渴。渴乌无转势 枯鱼自噓沫”。^⑥一向云沛雨丰的江南水乡，何时遭受过如此田坼地焦的百日干渴！

三年多的旱、涝、蝗、疫此起彼伏 赤地万里 千余日的饥殍相食 饿殍遍野 这难道仅仅是天道运行 人力难抗吗？

其实不然。天灾虽烈，人祸更盛。这一点汤显祖看得非常分明：“天貌此沉沉”，^⑦“物极天为震”。^⑧他开始怀疑究竟是“天道远”还是“人道远”。他断言 如此灾疫连绵 是“地津竭”的征兆，暗喻着大明江山气数已尽。^⑨

从万历十七年（1589年）汤显祖四十岁上喟叹大明江山“地津竭”而倒回去二百二十年，明太祖朱元璋创业伊始，尚能励精图治，其勤政之态着实有几分国君的威严。

朱元璋规定，文武大臣除早朝外，还须午朝和晚朝。政府各部有一百八十五种事项必须面奏皇帝。这一近乎苛刻的勤政规定，一直沿习了近七十年。直到第六代正统皇帝登基时，因他尚只有九岁，才规定取消午朝和晚朝，早朝也只以呈报八项要事为限。

但直到十五世纪末期，早朝这一象征国家政权机器运转的仪式也很少间断，即便是雨雪交加也坚持不辍。1498年的一天夜晚，宫中失火，弘治皇帝彻夜未眠，神志恍惚，他几乎是以央告的口气，请求大学士同意免朝一日。^⑤可知，在明王朝开国后的百二十年间，君臣的整体态势还是倾向于有所作为，以国家利益为重的。

可自1506年正德皇帝登基始，明朝在剩下的一百多年间的七任皇帝中，除崇祯皇帝外，几乎是一个比一个乐于废弛朝纲，或寻求享乐，或炼丹求仙，或消极拒朝。

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十六年，却很少过问朝政，常离京都几个月，甚至一年不归。江南的秀丽风光使他乐而忘返，满天下“游龙戏凤”，奸淫民女，所经之地，竟至于“民间汹汹，有女者一夕皆适人”。^⑥

正德登基未逾两年，他就厌倦皇宫中的禁锢，迁出紫禁城，在京都空旷处建了新住宅，名曰“豹房”，内有精舍、猎房和俱乐部。朱厚照整日就与宦官、倡优、喇嘛及异域术士嬉戏游猎，乐此不疲，将朝政置于脑后。有时甚至假借晚朝之名，将宠信的宦官、文武大臣聚集宫中，大开宴席，通宵达旦，极尽享乐之能事。^⑦他还亲自训练老虎，结果为虎所伤，他又亲自驾轻舟，亦几乎丧命鱼腹。1521年初，这位享乐皇帝就病死在“豹房”之中。

1522年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临朝。正德皇帝的亲信被欲振朝纲的大臣清除掉，尤其对几个助纣为虐的宦官、武官处以极刑，这对嘉靖帝和满朝文武百官有所震慑。而朱厚熜作为旁支子孙而居帝位，为巩固地位，也谨言慎行了二十年。可他到中年后，逐渐显露出对各种朝纲礼仪的冷漠拒斥，开始沉溺于言佛佞道、祈求长生的虚幻氛围之中。

朱厚熜在宫中大建斋醮，诏方士献淫乱无度的“采战”术。又修坛炼丹，企求长生不老。1550年，汤显祖出生时，嘉靖帝已

搬出紫禁城，住在离宫别苑，不理朝政，整日追求“不死之药”，终于在 1560 年被“伪造诸品仙方”送掉了老命。

1567 年到 1573 年，是隆庆皇帝在位期间。这位庸碌的皇帝在五年半的皇位上，即便是前几年举行早朝，他也如同木偶般对国政一无所知，常常让大学士代答百官呈奏。后几年，干脆连这儿戏般的早朝也免除了。^③

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朱翊钧，于 1573 年登基。这一年汤显祖二十四岁，而万历皇才刚刚九岁。年幼的皇帝受制于大学士张居正和宦官“大伴”冯保。张居正以让幼皇有更多时间攻读圣贤经传为名，规定一句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可事实上这形同虚设的早朝，日后也因圣旨而免朝的情况也越来越多。^④

1582 年张居正死后，万历皇虽在臣僚们的鼓噪下清算了张居正专权，张之密友“大伴”冯保也被逐出京城，但臣僚们以宪政纲常不可违逆之理，不允许万人之上的皇帝按照自己的意志废长立幼，以自己的爱妃郑氏生下的皇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由此，万历皇一直心怀不满，对朝政更无心过问，开始迷信道教，沉湎酒色，以火气过旺为由提出放弃早朝，以事休养。

朱翊钧不足二十岁就为自己死后的陵寝定陵开始筹划、看风水。仅 1583 年到 1585 年两年半的时间，他就带领几千人浩浩荡荡几次去谒陵，一心为自己死后的排场作安排。^⑤万历十四年到十七年，当全国发生持续三年之久的旱、涝、蝗、疫大灾难之时，这位置天子职责于不顾的一国之君，却正在与宦官掷银为戏，从中取乐，^⑥对生灵涂炭的百姓苦难不闻不问。难怪灾难发生千余日后，朝中才派出官员赈灾。

正是因为明中叶后历代皇帝疏于朝政，将手中的权力随意交与所宠信的宦官、大学士、辅臣，所以，明中叶后宦官干预朝政，奸相贪婪严酷，将大明江山逐渐推向崩溃的边缘。

到万历初年，宦官总数已逾两万，到明末，其人数竟达到十万之众。他们在宫中掌管厂库、寺庙、坊舍共二十四个机构，习称二十四监。^③尤其是由宦官把持的锦衣卫，东、西厂等特务机关，更是无孔不入，横行霸道。他们侦察和监视朝臣百姓活动、言论、刑讯、处决异端和叛逆，实行残暴的特务统治，其手段甚为狠毒。汤显祖所敬慕和相知的“两大教主”李贽和达观（真可），就是被锦衣卫先后杀害的。

这些宦官不仅豺狼当道，还利用皇上的宠信，大肆侵占官银民财，卖官鬻爵。正德年间，宦官头子刘瑾死后察抄其家产，黄金竟达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五千余万两。万历皇的“大伴”、司礼监太监冯保，这个掌管东厂锦衣卫特务的最大宦官，一向以清廉自居，但却前后接受各种贿赂据传有数以亿计（《明史·神宗本纪》说是金银珠宝百余万计）。他贪婪到自己的密友张居正死后，还亲自去张家取占了无价之宝珠帘五幅，夜明珠九颗。^④

宦官贪得无厌，奸相亦不示弱。嘉靖时，朝廷一年所得银两，不抵戍边军队一年之用。而奸相严嵩一年所贪，竟可支戍边军队数年银饷。严嵩死后被察没家产，仅黄金就达三十万两，白银二百万两，而珍宝更不计其数。

而据王世贞《严氏富货》^⑤记载，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大肆敛财，每当钱积满一百万两时，就邀高朋好友酒宴相庆，前后此类宴庆有四次。可知，严家搜刮到的民财起码在四百万两以上。

严世蕃每次在宴庆畅饮之余，还恬不知耻地评议天下最富之人。一次，他以敛财五十万两以上为富户标准，评出全国最富之人有十七家。而这十七家除山西三姓、徽州两姓是商人外，其余全都是王公贵族、太监豪门。可知明代人祸之巨。

宦官、首辅、权相利用“京察”和吏部“外察”大肆收受贿赂，这在明中叶后愈演愈烈，已是路人皆知的为官之道。朝中规定，四品以下的地方官，三年任满当入京朝觐述职，由皇帝及有关衙

门核定他们的政绩优劣，以定去留升降（“外察”），而京官则六年考核一次（“京察”）。

万历十五年前后，全国当时文官总数约为两万人，其中京官约占十分之一。^⑤而无论是一千一百多个县的地方父母官，还是京官，都对这种重在人事关系的考核战战兢兢。他们都非常清楚，谁也不会详细了解关心你的政绩若何，关键看你与考核官的亲疏与否、纳贡多少。万历年间有两千多官员在几次考察中被罢免，也多与贿银多寡有关。难怪 1587 年在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所辞世的特立独行的清官海瑞，就曾讥讽“京察”之年为京官大臣，尤其是大宦官、首辅、权相的“收租”之年。^⑥

宦官、首辅、权相之所以敢如此大肆收受贿赂，侵吞国库，正是因为他们所侍奉的天子就是最大的贪官。皇帝聚敛、兼并、掠夺土地，占有大量的庄园。明朝开国不到一百年，到孝宗时，皇帝本人所占有的土地，已达全国私田总数的七分之一。万历皇朱翊钧为立郑爱妃之子常洵为太子，与坚持宪政纲常不可更变的臣僚消极对抗了十年之久，最终迫于压力封皇长子常洛为太子，封皇三子常洵为福王到河南之国。为了平复心灵留下的永久伤痕，和对臣僚逼迫他屈服的仇恨，也安慰郑爱妃母子，他竟一次赐予福王庄田达四万顷，即四百万亩之巨，接近当时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一，可为数十万人耕食之资。后因群臣反对，最终讨价还价为两万顷。仅此一项，福王就可每年收取河南、山东、湖广三地的土地赋税银四万六千两以供挥霍。^⑦

上行下效，诸王、勋戚、宦官、臣僚所占庄田大都在万顷以上。世宗时的首辅徐阶，占田竟达二十四万亩（有说四十万亩^⑧）。万历时江南有的大地主官僚，占田至七万余亩，以致十分之九的农民失去了维系生命的土地，沦为奴隶般耕作、上交赋税的佃农。这正是明中叶后不断发生农民起义、明王朝政治危机愈来愈深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汤显祖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至二十六年在遂昌任知县期间，他的施政纲领的最重要一项就是抑制豪强，坚决察清大户田产，严厉催交赋税。他拿全县最大的田产家族首领项应祥开刀，因项氏家族依仗项应祥在京都为官的权势，抗交赋税。汤显祖关押了项氏家族几个人为人质，并亲自给项应祥写催交赋税书。由此，项应祥对汤显祖有切齿之恨。汤显祖被迫去职还乡，并最终被罢免官职，都与项应祥从中作祟，以解心头之恨有关。^④

皇上贵为天子 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土地所产出的一切财富，自然任其挥霍、占有。嘉靖皇帝奢华无度，仅为他烹调御膳的厨工就多达五千六百余人；御苑养豹一只，用役二百多人，占地十顷，每年光支粮就达两千八百石。嘉靖又极喜爱珍珠宝玉，一次下令采集珍珠，死者五十余人 而得珠仅八十两 天下谓之‘以人易珠’。^⑤

万历年间 紫禁城内更是极尽豪华 除了直接为皇室服务的烤饼坊、造酒坊、甜食坊、兵冑坊、马房、印书藏书厂库外 还设立了“针工”“内织染”等“八局”织造各种龙衣章服 供皇亲国戚穿用和赏赐。每年光这类高档织品定额，就在十五万匹之多。而宫女之众，至少也在三千人以上，光为这些人死后准备的棺木，一次即达两千口之多。^⑥万历十六年（1586 年）三月 江南已是汪洋一片，大饥疫蔓延，百姓死无计数。可八月间，万历皇仍经昌平天寿山视察自己的陵墓，一次就挥霍银子二十万两，全由国库支出。

如此豪奢、享乐 又加上宦官、首辅、臣僚大肆侵吞官银 中饱私囊 因而国库空虚 入不敷出 自是必然。在嘉靖时 国库存银就不足十万两，财政亏额高达一百四十余万两。到万历年间，自是更加亏空。这就难怪 1583 年查没万历皇的“大伴”宦官冯保的上亿财产时，朱翊钧既喜且怒了：喜在当时皇弟潞王成婚在

即 国库亏空 这批金银珠玉珍宝刚好派其用场 怒的是，一个宦官竟然拥有如此家财，可见天子的大权旁落到什么程度。^③

到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国库已经空虚到无法再支付宫廷糜费和军政开销 因自万历二十年 宁夏用兵 费帑金二百余万 其冬朝鲜用兵 首尾八年 费帑金七百余万 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匱。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 二十五年 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 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④ 万历皇朱翊钧下诏从这一年始开金矿 设税监 派宦官四处收取矿税 以充国库。七月 宦官还在畿内督开金矿，搜刮民财，八月，宦官就到了山西、陕西、浙江。所到之处地方官也借机层层盘剥百姓，收税宦官也乘机大肆纳贿敛财 被百姓咒为“搜山使者”。

到山西开矿收税的宦官张忠、孙朝，只因经过太平县时知县不曾迎接，就将典史武三杰提责致死；他们向建雄县丞李逢春索钱不遂 县丞就被他们凌辱致死。他们贪婪已极，除了金银珠宝 还向各路勒索土仪、帐幔、手帕、绒衣、绒毡 多则千余件 少则数百件。

到湖广收税的御马监奉御陈奉，到承天府（安陆府）向百姓勒索黄金，连妇女也横加拷打、威逼。钟祥知县邹光弼抵制横征暴敛税款，陈奉就将知县也拘禁起来。^⑤

正是这些或专遣、或兼摄的“大珰小监，纵拱绎骚，吸髓饮血”而使“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⑥而这些搜刮来的金银税赋 真正“以供进奉”入国库者 还“不及什（十）一”，^⑦大部分被这些“搜山使者”私吞。

所以，一些正直的地方官和朝中大臣，如山西巡抚魏允贞，刑部主事谢廷赞 凤阳巡抚李三才等 都意识到这“搜山使者”给已经衰败的国家带来的巨大威胁，纷纷上疏请罢矿税，但万历皇却一概置之不理。^⑧